

20 世纪上半叶私家印章收藏之特点研究

林 如

摘 要：随着近代金石学的持续发展，印章、印谱收藏有长盛不衰之势。20 世纪，这主要表现为私家收藏和博物馆收藏两大类型，早期因为社会不稳定导致文物多有散佚，为私家收藏的兴盛带来契机，后半期因为国家文物文化资源的汇聚整合，公共博物馆收藏的逐渐集中，成为 20 世纪后期印章收藏的主线。本文以 20 世纪早期的私家印章收藏为导向，从印章收藏家的身份特点、收藏的类型和特色、收藏家的收藏观念、藏品的来源，以及私家印章收藏兴盛的原因分析等方面，梳理 20 世纪私家印章收藏的特点、范围和流通方式，揭示印章国粹意识文化功能、艺术价值、考古出土、个人家族、朋友圈乃至金石印学社团组织活动的推动对 20 世纪私家印章收藏的兴盛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20 世纪上半叶 印章私家收藏 特点 兴盛原因

清乾嘉以来，金石学继两宋之后达到又一高峰，这有赖于社会环境的催生与考古科技的发达，文人学者们钟情于金石搜寻、收藏、考证与研究。作为金石的一部分，玺印也不无例外地进入金石鉴藏家的视野，从宋元开始就已经有收藏古印和辑拓印谱的记录，到明代有了传世的古印印谱，以隆庆五年（1571）顾从德《顾氏印藪》、万历二十八年（1600）范大澈《范氏集古印谱》等为代表。因其时代较早，并以原印钤拓而尤为珍贵，此时已颇见古玺印收藏、著录和流传之盛。

20 世纪之前的晚清出现的印章大藏家就已不胜枚举，著名者如张廷济、吴式芬、吴云、吴大澂、陈介祺、高庆龄等。随着玺印考古出土数量的不断增加，考证研究之风兴盛，集古的热度也持续不减。正如黄宾虹《周秦印谈》中提道：“近百余年，士夫考订金石，駉駉日盛，簠斋万印，窻斋千玺，器物虽小，搜集益繁……”^①可见近代以来玺印收藏风气之盛。20 世纪以来，正是有了前代人文背景和物质条件的积淀，印章收藏才得以延续和蓬勃发展。

20 世纪印章收藏的脉络，大致以新中国成立前后为界线，基本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私家收藏鉴赏为导向。清政府衰落至解体，军阀割据，兵戈扰攘，古物多有散佚，为私家收藏的兴盛和流通带来契机。从印章收藏家收藏的集中时间点来分析，民国初期为一小段高峰期，40 年代又有一个小高峰，50 年代，百废待兴，公共博物馆等文物机构还处于兴建的阶段，私家收藏也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文物交易市场开放，印章的私家收藏也比较活跃，但是后期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文物市场出现监管制度不够成熟等问题，文物鉴藏也呈现比较复杂和混乱的现象。

^① 黄宾虹：《周秦印谈》，《黄宾虹全集·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7 页。

后一个阶段以博物馆收藏和捐赠为导向。新中国成立后，对文物管理制度的整顿，以及国家文化资源的集中整合，通过募集、捐赠、考古出土收集等方式，公共博物馆的收藏逐渐集中，成为20世纪后期印章收藏的主线。当然，文物捐赠的优良风气在民国时期的公家单位收藏或社团组织中就有所呈现，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对故宫博物院的古玺印捐赠、西泠印社的印章捐赠，一直延续至今。但是相比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稳定的公共博物馆和文博机构为文物的妥善保存和公众文物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障，这也是文物最好的归属。通过这两条主要脉络可窥20世纪印章收藏的大致面貌和格局。本文主要以私家印章收藏为中心，从藏家类型及其鉴藏观念、藏品特色以及其收藏来源等方面，梳理20世纪前半期的印章收藏特点和流通状况。

一、玺印鉴藏家之身份特点

延续清末印章收藏的风气，加之社会动荡带来的文物流转和聚散不定，20世纪尤其是上半叶的印章私家收藏呈现较为兴盛的态势。几大印章收藏巨头的藏品辗转散出，或经家族后辈传承，几经易主，形成了新的印章收藏家个体或群体格局。根据藏家的身份，可以将印章收藏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为印学家、篆刻家。代表人物如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丁仁、王福庵；篆刻家高时敷、易均室、张鲁庵、钱君匋、赖少其等，不胜枚举。他们精篆刻，擅印学研究，好金石鉴藏，有诸多收藏印谱行世。^①印学家、篆刻家收藏玺印有较为明显的为篆刻创作和研究之目的，过眼的真迹多，才能真正体会古印的奥妙所在，学习、创作才能得其真谛。正如有印学家所言：“学摹印者，须见真印，熟视而详审之，庶可识庐山真面，收事半功倍之效。”^②如钱君匋钟情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三家篆刻，极力搜寻收藏他们不同时期的印章作品，如此可研究篆刻家们的创作历程和风格演变的过程，并能为自身的创作提供借鉴。“至于吴昌硕刻印的历程，我们在他的早年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从浙派入手的痕迹，‘井公’‘子宽’‘落拓道人’等钮为最显著的例子。稍后，受徐三庚的影响，如‘武陵人’‘子宽又号杰之’等钮，犹存让头舒脚之风……”^③他以藏印的创作年份为序编辑成谱，甚至在编辑所藏赵之谦印的过程中，除自藏印章，还向友人借拓以补充完善，以求清晰全面地留存、传扬赵之谦的篆刻艺术风貌。钱君匋的篆刻艺术创作，也是取法丰富，他属于风格多样的多面型篆刻艺术家，他的篆刻艺术成就有很大的原因源自其丰富的篆刻收藏。

二为金石、古文字学家，学者。如较早期的陈宝琛、刘鹗、端方，后有罗振玉、陈汉第、王

① 吴隐集所藏玺印为《遯盦集古印谱》；丁仁集家藏、自藏印章，编成《丁氏秦汉印谱》三十卷（1904）和《西泠八家印谱》四卷（1925）；王福庵有《福盦藏印》十六卷；高时敷辑所藏古玺印成《乐只室古玺印存》，辑明清名家印作成《丁黄印范》《二陈印则》《次闲篆刻高氏印存》等；易均室收集整理印谱十多种，又徐立根据其收藏的历代官私玺印和明清流派印两百余方，整理编辑《易均室先生藏用印选》；张鲁庵收藏历代名家印谱，积四百余家，集收藏印谱之大成，又积历代印章四千余方，可谓民国时期印章收藏之巨擘；钱君匋以收藏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篆刻精品著称，编辑《豫堂藏印甲集》《豫堂藏印乙集》《丛翠堂藏印》；赖少其集中西绘画、书法篆刻创作于一身，所收明清流派印皆名家精品。

② 王友石：《陈师曾先生摹印评述》，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

③ 钱君匋：《钱君匋论艺》，西泠印社1990年版，第117页。

献唐、周叔弢、商承祚等。^①金石、古文字学家们并非皆擅长治印，他们收藏古玺印、古陶印等，多取其金石文字考证、历史研究之价值。刘鹗就在其《铁云藏陶》自序中云：“抱残守缺斋三代文字之二，世之宏博君子欲考篆籀之原者，庶有取焉，计海内收藏家所得必数倍于此……”“姑以敝藏所有拓付石印附诸陶器之后，虽非三代文字，然其中官名多为史籀所不载，殆亦考古者之一助云。”^②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曾明确提出其收藏古玺印之意图：“一者以文字新异者录入，俾研究古文字发展规律；一者以官印、私印可征时代地名、官名之变迁者见存，以考证史书，参稽历史。”^③罗振玉于1927年以所集西夏官印影印，辑《西夏官印集存》，为断定和考证西夏官印的第一部著作。其在序言中有言：“西夏官印，前人不能定其时代，予以印背凿款，始断为西夏。三十年来所见不下廿余，尝取其背著年号者十有一，为一谱……”^④古玺印、古陶印中的文字、形制为金石研究提供有力支撑，这也是金石学者古印收藏的特殊价值、目的所在。

三为玺印爱好者。如龚心钊、朱鸿达、葛昌楹、华笃安、孙正刚、李培基等。^⑤金石玺印爱好者也未必人人都能刻印，或者富有印名，有些也并非收藏世家，但他们收藏的眼光和用心程度并不亚于篆刻家或研究者，并且多以保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如龚心钊喜收唐以前的玺印，丰富精美，且对每方印从里到外都进行精心包装，连鉴藏家谢稚柳都感叹其玺印收藏的包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可见其对玺印收藏的爱好和用心。华笃安作为实业家，对流派印章的收藏却是情有独钟，华笃安集中收藏明清流派印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但早年已有积累，他从丁辅之手中购得上千方流派印，此后又陆续增添散印，其收藏目的，一为个人喜欢，二也体现为以国家和民族整理、研究文化遗产为己任的精神。他曾说“这些（印章）都是国家的文化遗产，等我整理、研究好就将它们交给国家，它们最终是国家的东西”^⑥，体现了老一辈实业家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

四为兼具金石、文字学研究、篆刻创作、鉴定的综合型藏家。如黄宾虹、马衡等。^⑦黄宾虹认为古玺印之意义有多方面：“以古玺印与卜辞、金文、古陶、木简相印证，更明籀篆嬗变之迹，经

① 如陈宝琛《澂秋馆印存》、刘鹗《铁云藏陶》、端方《匋斋藏印》、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西夏官印集存》、陈汉第《伏庐藏印》、王献唐《两汉印帚》《海岳楼藏印》《临淄封泥文字》《双行精舍陶骨印存》，周叔弢藏印由天津艺术博物馆编为《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出版发行，商承祚有《梨斋藏印集》。

② 刘鹗：《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3、98页。

③ 林明、谢光辉编：《黄土陵印存》后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④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677页。

⑤ 龚心钊藏自战国至六朝铜、玉、石官私印两千多方，且每方都有精心包装；朱鸿达搜集邓石如、丁敬、奚冈等明清流派印人印作二十载，积数千方，选八十六家印作四百零二方，成《宾鸿堂藏印》，又有《志庐藏印集》；葛昌楹一生以“集藏金石，辑为谱录”为志趣，所藏明清流派篆刻辑成《晏庐印存》《吴赵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邓印存真》；词学家孙正刚藏名家印章上千方，号“千印长”，富印谱收藏；李培基《古鉴斋藏印集》载历代玺印数千方，多得自归绥，第1、2册为古玺，第3册为古玺与肖形印，第4册为秦汉官印、两面印，第5、6册为汉魏私印，第7册为唐宋之官私印，第8册为西夏印及元押。

⑥ 郑重：《方寸之间天地宽——华笃安与流派印章》，郑重《海上收藏世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⑦ 黄宾虹辑有《宾虹集印存》《宾虹草堂集古玺印谱》《宾虹草堂藏古玺印》等，著有《叙摹印》《叙印谱》《周秦印谈》《古印概论》等印学方面的文章，又有《古印文字证》《说文古玺文字征》等玺印文字之研究成果；马衡有自刻印谱《凡将斋印存》，又有《凡将斋金石丛稿》《谈刻印》等金石、印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籍移写之源，触类旁通，时多弋获。”^①道出古玺印与文字演变、经籍研究之关系。其收藏古玺印主要因为古玺兼具文物和古文字研究的价值。在鉴定古印时，黄宾虹也是以其综合才能从多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从艺术实践上把握篆法、刀法、章法；二从古文字识别、考证研究入手，得其遗传演变的特征。他认为玺印收藏的功能并非为藏而藏，而是可印证诸多文字、艺术形式的发展，可观先贤的思想和智慧。而关于古玺收藏对于篆刻创作的意义，他则认同“汉魏古印，楷模百世，尤学书者祖钟、王，学诗者宗李、杜，广搜博览，自有会心”这样的观点。^②作为综合型藏家，其玺印收藏的角度往往是多方面的，对玺印功能的运用也发挥到极致。黄宾虹、马衡皆为典型的集篆刻家、金石家、鉴赏家于一身的玺印收藏家。

二、印章的收藏品分类及其所体现的收藏观念

历来较为专业的收藏家，其收藏都会有一定的目标，以收藏品的种类和范围为导向，体现他们的倾向性喜好和专题收藏的理念。对印章的收藏也呈现出以下几种主题分类取向。

第一，以古玺印收藏为大宗。大多数藏家钟情于古玺印收藏，晚清最著名的陈簠斋万印楼《石钟山房印举》，就是辑集各家古玺印成谱之先河。清代以来倡导金石学风，学者们以藏三代秦汉金石玺印为时风，簠斋自称：“今日而好古，唯多收三代吉金文字与三代吉金，是古人文字之真，足与六经并重。藏书则次之，藏汉以后碑版、晋以后书画又次之，而皆易近玩物矣。”^③三代秦汉古玺印皆属于金石文字之列，因此尤为藏家所重，成为印章收藏的主要对象。清末陈介祺、吴大澂被认为首创“玺印之学”，而潍县高庆龄所辑《齐鲁古印摺》则为更早，尤将古玺排在秦汉印之前，是为历代印谱之首创。^④因此清末民国时期的印章收藏，也基本如此延续，大多数藏家的藏品都以古玺印为大宗。如陈汉第《伏庐藏印》，全部为古玺或秦汉王侯、将军精品官私印，质文并佳。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大都为精心收藏的周秦两汉古玺印，其四十岁游京都，一年间就陆续购得古玺印近百方。^⑤陈宝琛辑《澂秋馆印存》十卷，为先德子良公得自关中的古玺印及自藏数十年的古玺印谱，有官印、古玺、秦玺、姓名印、吉语等700多方，其中以秦玺数量最多，罗振玉认为唯有此谱可与陈介祺《石钟山房印举》、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相媲美。^⑥黄宾虹收藏古玺印几千余钮，有《宾虹草堂集古玺印谱》《宾虹草堂藏古玺印》《古玺印存》等，他在《宾虹藏印二集》自叙中说道：“金石文字，昕夕摩挲，惟于玺印尤所酷好。屡得屡失，可千百计。”^⑦故其收藏也都以战国秦汉古玺、官私印，还有巴蜀古印等为专题，著《玺印古字》《宾虹草堂玺印释文》等，其鉴赏印章也尤“以古为美”。龚心钊藏自战国至六朝、唐代的铜、玉、石官印、私印2000余方，

① 浙江省博物馆编：《古物影——黄宾虹古玺印收藏集萃》曹锦炎代序，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版。

② 黄宾虹：《叙摹印》，《黄宾虹全集·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③ 陈氏家藏稿，参见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④ 王崇焕：《印林清话》，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页。

⑤ 沈金涛：《罗振玉印谱序文中得印论研究》，《书画世界》2022年第1期，第91页。

⑥ 罗振玉：《澄秋馆印存·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版。

⑦ 《宾虹藏印二集》自叙，参见浙江省博物馆编：《古物影——黄宾虹古玺印收藏集萃》，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版，第285页。

而至唐以后的印章就不在其收藏视野之内了。高时敷1944年编《乐只室古玺印存》，是高氏精选所藏古玺印钤拓而成，收藏范围也是战国至秦汉魏晋官私玺印、吉语印、肖形印，共计十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第二，封泥、古陶印等的收藏。虽然材质不同，封泥和陶印对于金石、古文字研究者而言，和古玺印具有同样的功用。因其学术价值所在，封泥被发现、得到考证以后，即为诸多金石收藏家所关注，逐渐进入收藏家们的收藏、雅玩、研究视野。古封泥见于先秦文献，但实物最早被发现是在19世纪上半叶，吴荣光将其摹入《筠清馆金石文字》，算是最早著录封泥的著作。而对封泥的功用等进行系统研究，则始于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将古封泥的学术价值归结为三点：“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禘六书，二也；刻划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①郑盦潘祖荫收官私印、封泥304方，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辑成《郑盦所藏封泥》。罗振玉1903年为《郑盦所藏封泥》作序以后，又集潍县高氏（高鸿裁）旧蓄，为郑盦所藏封泥重新选辑，各自为拓，为《齐鲁封泥集存》。1904年刊行的陈介祺、吴式芬合辑《封泥考略》十卷，著录了蜀地、西安、山东出土的封泥，也是第一部系统著录、考释封泥的专著。^②陈介祺收藏的古封泥，辑成《篁斋封泥》。^③刘鹗亦有玺印、封泥和陶印收藏，专著有《铁云封泥》《铁云藏陶》。^④陈宝琛的封泥收藏也颇为可观，在其《澂秋馆藏古封泥》中可见一斑。^⑤王献唐除了玺印收藏以外，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封泥和陶印。王献唐对封泥进行了拓印、著录和研究，1936年成《临淄封泥文字》。通过考古实地考察，结合传统金石研究方法，王献唐将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制度各个角度进行考证，解决封泥的断代问题。^⑥王氏1937年又拓印《齐鲁陶文》七册，又有《双行精舍陶骨印存》行世。此外，诸如郭裕之^⑦、王懿荣、丁树桢、孙文澜、高鸿裁、周进（季木）等人，封泥收藏亦不在少数。

第三，明清流派印收藏。我们一般所指的古印收藏，大多指的是明清以前古玺印的收藏，清代及民国时期也大都以古玺印收藏为主，但也有一部分印章收藏家将视野放在明清以来的流派印上。如钱君匋，“浙西四家”的钱塘丁仁、杭州高时敷、平湖葛昌楹、余杭俞人萃，另有商承祚、赵时柎、胡佐卿、华笃安等。

如钱君匋对明清流派印的收藏，以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三家为最富、最精。捐于桐乡君匋

① 罗振玉辑《郑盦所藏封泥》并在序文中所述。

② 《封泥考略》作为一本刊行的刻本，体例较为完备，编排有序，按照官、私、闲章类别，时间先后，社会地位，官职性质，行政区划级别来分类编排，拓片并附考释。

③ 《篁斋封泥》共五册，录古封泥拓片422枚，内有吴大澂手批和收藏印，后为苏州吴县篆刻家王大圻所得，1924年以后又被赵叔孺购得，有赵氏收藏印。参见白谦慎：《吴大澂和封泥研究》，《中国书画》2020年第2期，第4—7页。

④ 《铁云封泥》录有古封泥752块，实则其封泥收藏远远不止于此，其中收藏最多的是汉代封泥，晋代次之，秦代较少。《铁云藏陶》是学者研究古陶文必备的一本系统性著作，其中著录陶印45方。

⑤ 《澂秋馆藏古封泥》收有汉朝、汉诸侯王属、汉列侯属、郡县等官印封泥，也有汉蛮夷印封泥、新莽伪官封泥、私印封泥以及无考各印封泥，共计有242枚，其中郡县官印封泥达146枚，是其中数量最多者。参见张爱华：《陈宝琛家族书斋金石圈个案研究》，《中国书法》2016年第5期，第191—192页。

⑥ 《临淄封泥文字叙》记录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征集收藏封泥的过程，同时也透露了当时临淄封泥出土情况以及一些封泥收藏家的信息，如城北刘家寨农田出土数十枚，由益都商贾马裕枢、杨宗岐等收集入馆藏等。

⑦ 郭裕之所藏封泥170件现藏于北京大学，这是国内公立机构收藏研究封泥的开端。

艺术院的印章，有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印章近五百方，大多是精品。^①钱君匋将所收赵、吴、黄三家篆刻分别拓编而成《丛翠堂藏印》（收黄牧甫印170方）、《豫堂藏印甲集》（收藏赵之谦印）、《豫堂藏印乙集》（收藏吴昌硕印200方），按篆刻的创作年份编次，让观者能够大致了解篆刻家的篆刻创作历程以及前后创作风格的演变。葛昌楹兄弟广搜明清名人刻印2000余钮，精选400钮，十年间辑《传朴堂藏印菁华》十二卷，凡明清重要印家精品均搜罗在内。又有辑拓于1931年的《吴赵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邓印存真》等。1937年，葛昌楹与丁仁、高时敷、俞人萃，各出日军侵华劫余所存之印，以“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己卯春成书”共21字为编号，辑《丁丑劫余印存》二十一部。《丁丑劫余印存》是“浙西四家”收藏明清文人篆刻原石，收录从明代文徵明到民国印坛诸家篆刻的大汇集。^②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笃安的明清流派印主要来源于“浙西四家”葛昌楹传朴堂、丁辅之八千卷楼、高时敷乐只室三家旧藏，80年代悉数赠予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内明清藏印的五分之四属于华笃安捐赠，华氏可称为明清流派印的收藏大家。

第四，印谱收藏。印谱不仅收集、承载了玺印篆刻之美，具有欣赏和研究的功能，同时印谱本身即可涵盖书籍、编辑、钤拓、印刷、出版等历史文化内涵，在印章实物之外独具收藏魅力。20世纪以来最为有名的印谱收藏家如周叔弢、张鲁庵、戚叔玉、郭组南、孙正刚等人皆为印谱收藏领域之翘楚。周叔弢从1916年开始收藏古印谱，通过书肆购买、友人代寻觅等方式，于1940—1948年间收藏最为集中。张鲁庵收藏印谱四百三十三部捐于西泠印社，其中三十七部印谱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戚叔玉印谱收藏有《十钟山房印举》《双虞壶斋印存》《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读雪斋印谱》《十六金符斋印存》《澂秋馆所藏印》《伏庐藏印》《封泥考略》等。郭组南收有清乾隆《金薤留珍》、汪启淑《汉铜印丛》、程荔江《秦汉印谱》、吴宓斋《十六金符斋古印谱》、陈簠斋《石钟山房印举》、陈宝琛《澂秋馆印存》等，且对于收藏印谱颇有自己的标准，以秦汉印谱为宗，印谱所收印章内容皆多且少有伪品。^③孙正刚收藏印谱百余部，包括明《顾氏集古印谱》，清《飞鸿堂印谱》《石钟山房印举》《西泠四家印谱》，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三家印谱钤本等，蔚然大观。

私家藏品的种类和特点可以体现印章收藏家的鉴藏观念。首先体现的是专题收藏的观念。清代金石收藏兴盛以来，有目标、有意识性的专题收藏屡见不鲜，已经形成一个“群体”，影响并推动大批收藏家。专题收藏的规模有大小，但可以说是此时金石收藏的一个特色。专题性的收藏目的往往不局限于一般的雅玩，而是进入专题学术研究的领域，藏品的收集、编纂都不是简单的排列，而是在编纂体例和内容当中体现作者的学术思想、创新思想。若收藏的规模达到顶级，更是“品牌式”集大成的收藏，这样的专题收藏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标志而进入学术史。陈介祺的《石钟山房印举》便是一例，民国时期的印章收藏家出于本人持之以恒的爱好、研究和信念，大多

① 钟桂松：《中国出版家·钱君匋 曹辛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② 《丁丑劫余印谱》由273家印人1900多方篆刻辑拓编成，附印人小传，并注明材质，王福庵为《丁丑劫余印存》题写签条、扉页并刻卷首多字印，高野侯撰序言。参见郭超英：《葛昌楹先生捐印记》，《西泠艺丛》2022年第9期，第18—21页。

③ 郭组南：《枫谷语印》，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

延续了专题收藏的方式，其规模和影响不容小觑。

其次是体现印章收藏家“以古为美”“以稀奇为贵”的鉴藏观。黄宾虹“以古为美”的鉴藏观可以从其购藏古印的标准上得以体现：“古文奇字印以秦前为佳，两汉次之，官印须罕见，于文字无所裨益者一概摒弃。”“近人喜蓄周秦印，而不欲得汉魏六朝印，诚以籀古新奇，增多古趣。”^①又云：“识得古人笔法，自不至为伪刻所欺。吉金当以多见一奇字为幸，官印尤尚新奇。伪者知求奇，而不能于所见外，别求所谓奇，贾人能为之，铜贩能别之。学士大夫，不可不于奇字中求其故也。”^②因此，宾虹藏印多奇品和异品。他在《古印概论·篆刻名家之法古》一节中说道：“学士文人，偶尔奏刀，遂夸雅事。篆法章法，弃置弗道，意不逮古，流为孱弱……程邃自号垢道人，朱文仿秦小玺，最为奇古……”^③对印人艺术水平的评判也以是否合古意、有古趣为标准。他将古玺印辑录成谱，专门选择前人未有的玺印文字加以分类考释，也体现其“以稀为贵”的古印研究观念。同样，郭组南收藏印谱的标准是以秦汉古印谱为宗，选择玺印的数量多且少有伪品，富有特色而不与他谱重复者，以稀为贵：“秦汉印谱，琳琅万品。如无大力，自难网罗。只有约择选购，以作研磨之资。余之所择，如清乾隆之《金薤留珍》、汪启淑之《汉铜印丛》、程荔江之《秦汉印谱》、吴宓斋之《十六金符斋古印谱》、陈簠斋之《石钟山房印举》、《澉秋馆印存》及西泠印社之《遯盦古印谱》等。存印以《印举》为最夥，《十六金符斋》《澉秋馆》次之，再次则《遯盦》四集，均属多佳少伪，可据以为印典。至若《双虞壶斋》《二弩精舍》《漱石轩》《匋斋藏印》诸本，则大同小异，前数谱可包而有之矣。《石钟山房》《十六金符斋》《澉秋馆》三种，各有他谱所无之印，是其特长。而尤以螺江所蓄执法直二十汉印，清丽遒古，不可多觐也。”^④

对于明清流派印，因为年代相对比较近，数量也较多，藏家们大多奉行“宁慎勿滥”“宁精勿泛”的观念。比如葛昌楹收藏印章，对稍有疑虑、貌合神离的作品一概不收，极为谨慎。他对明清流派印收藏，秉持“严派别之分，泯主奴之见”的理念，较好地保存了明清流派印的精华原貌，系统梳理了流派印的历史递变和益进之迹。商承祚也搜集了一批重要的明清文人篆刻，其藏印虽不算最系统和丰富，但大多是清末民国时期金石考据学影响下的名家、大家作品，涉及南北几大地域的代表性核心篆刻家，如邓石如、吴熙载、吴昌硕、齐白石等，藏品质量高，仔细品读，可观文人篆刻极高的历史性、艺术性和文化性。这当然也归功于商承祚对古印、古文字、明清流派印的研摹，以及深厚的篆刻创作功底。^⑤

① 浙江省博物馆编：《古物影——黄宾虹古玺印收藏集萃》导读，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版；黄宾虹：《篆刻新论》，《黄宾虹文集·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② 黄宾虹：《增辑古印一隅缘起》，《黄宾虹全集·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③ 黄宾虹：《古印概论》，《黄宾虹全集·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④ 郭组南：《枫谷语印》，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

⑤ 深圳博物馆编：《梨斋藏印——深圳博物馆藏商承祚捐赠印章集》，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

三、印章、印谱之收藏来源

私家玺印、印谱收藏的来源有几种途径，主要包括家传、购求、互换互赠、考古出土等。近代金石收藏中不乏收藏世家，比如江苏吴氏，吴大澂是晚清时期仅次于陈介祺的玺印收藏大家，其《十六金符斋印存》为其所收藏的2300余方古印集，对印学界影响极大。吴大澂藏秦汉印及原钤印谱实物大多传至孙辈吴湖帆，包括陈簠斋所赠拓辑之《石钟山房印举》大本三部，每部九十九本，家传古玺印40余方、官印50余方、将军印28方，请陈巨来精拓。吴湖帆手录的印谱收藏目录中列有《十钟山房印举》百册、《十六金符斋印存》十六册、《十二金符斋印存》一册。潍县高氏家族藏印，包括高庆龄、侄高嘉钰、子高鸿裁藏印，高庆龄极力搜访古印500余钮，集侄子高嘉钰藏印150余钮，辑成《齐鲁古印摺》四册，后其子高鸿裁补录160余印，成《齐鲁古印摺补》，其外甥郭裕之又将自藏的1200余钮古玺印，辑成《续齐鲁古印摺》十六册，实为家族玺印收藏之典范。杭州丁氏家族收藏古玺、文人篆刻及印谱由来已久，尤以“西泠八家”为其中精品。时杭州人以集藏“西泠八家”印章为时尚，丁申对丁敬及浙人旧作的集藏可谓不遗余力，仅存世稀少的丁敬刻印，丁家就拥有72方。后丁丙自费辑成《西泠八家印谱》，到丁辅之辈，延续家传，进而收藏丁敬之印100余方，“西泠八家”之印500余方，编成《西泠八家印选》、《泉唐丁氏八家印谱》三十四册等。可见家学之渊源、积累对收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购求的方式也有几种，一是市肆中购买。时全国各地古玩市场都有古玺印出售，王崇焕《印林清话》中有描写西安古董肆之印存：“西安古董肆，以碑帖为大宗，而其次则古玺印。其来源与归绥略同。张丹斧佐陕军幕时，所得尤夥，官印骈列，每见精品。近岁饥馑军旅，相继而作，恐无复曩日形态矣。京师贾客，以道途荆棘，亦鲜至者。而国人惮于荒乱，无复雅兴。间有出者，率为洋商易去矣。”^①黄宾虹藏印多半得于市肆，黄宾虹购买古印出手极为大方，毫不吝嗇，若购入古谱录从未有的奇品则“为之狂喜不置”，因此，在黄宾虹初到上海之际，画名未显，而“富藏印”之名已著。罗振玉早年学习治印，便是从出售旧物的商贩手中购得一枚汉印开始，此后不断收藏印章，更是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从山东商人处先后购得古玺印千余方。^②到20世纪中期，大量古物在民间流散、流通，市场收购还是藏印的主要来源之一。比如周叔弢从1916年开始收藏古印谱，但主要集中在1940—1948年间，在古玩店尤其是京、津、沪地区如庆云堂、通古斋、宝林堂、樵古斋等所得颇多。钱君匋藏明清人印大部分也来自古玩市场，其所收的100多方赵之谦印，便是在天津劝业场的古玩店里以1500元的价格一次性购得。^③

二是为他人代购或介绍，可足不出户而有所得。陈介祺等大收藏家都曾委派估人游走各地搜购古玺印章，赵执斋辑《印邮》一书前有王懿荣作序：“薇垣（高文翰）与陈簠斋丈，论古为最契，尝走数千里为簠斋访古，万印楼所收藏玺印，多出其手。”^④可见高文翰是陈介祺藏印的主要代购

① 王崇焕：《印林清话》，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50页。

② 沈金涛：《罗振玉印谱序文中的印论研究》，《书画世界》2022年第1期，第91页。

③ 钟桂松：《中国出版家·钱君匋 曹辛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

④ 赵执斋：《印邮》王懿荣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人。民国时期代购和介绍收购依然是玺印收藏的主要途径之一。“许阁老人王兰西，喜收集玺印。官京师日，所得已多。洎至晚年，客寓津门。适值端忠敏公陶斋藏印散出，经厂贾张越言介绍，多为许阁老人所有。”^①又如华笃安所藏明清流派印章，为20世纪中期丁仁后人通过委托碑帖鉴藏家孙伯渊寻找买家而归于华氏。

三是友朋或他人手中转让或求得。如葛昌楹1911年前后在家乡平湖搜购乡贤旧印，最早始于金石收藏大家张廷济清仪阁藏品，后“遇印章辄致之归”，同时又“闻又能印者，无远近必求之刻”^②，几十年积累而成后来之规模。周叔弢收藏古印除了由傅大卣、顾德威等玺印鉴赏家代购以外，另一主要途径就是收藏家转让，如吴式芬、胶西柯昌泗、海天楼巢章所藏玺印，又有陈介祺万印楼藏印和陈紫蓬燕陶馆藏印，收藏来源较为清晰。

四是媒体广告征集。民国时期的《申报》等刊物上时常可见与篆刻相关广告，葛昌楹曾于嘉兴籍名报人钱芥尘创办的《晶报》上刊登“收集犀角印章广告”，阐明收集犀角印章之所好、用途、所收印章的要求、交易的场所等信息。利用媒体的广泛宣传效应，也是玺印收藏的另类有效途径。

近代以来，考古科技不断发达，出土文物层出不穷，因此与金石相关的收藏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即发掘出土所得。古玺印出土为印章研究以及创作提供了诸多借鉴，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记褚德彝对其所说：“无论读书习字，总觉后不如前，惟独治印，愈后愈佳。”释其缘由，则谓：“因近代时有古玺印出土，后人见识既广，借镜益多，艺之猛进，亦当然耳。”^③出土新材料的发掘为后代篆刻家开拓眼界、超越前人奠定物质基础，也给20世纪的玺印收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资源。罗振玉在给陈宝琛的《澂秋馆印存》写的序中提道：“窃维古印玺出土之地三，曰关中，曰山左，曰归化，故诸家谱录所载大半出关中，其出山左者什一二，归化者什二三而已。”^④王崇焕《印林清话》也有所记：“归化绥远为汉唐塞上之地，土高地厚，又未多经兵燹。以故春耕垄上，时有古物发见，尤以新莽以前玺印为多。铜玉之章，往往可逢，吴子干杰官绥远日，每以贱值，得大批古印。交由姚贵昉辈，携至京津，而自留其精品。子干既歿，后人不能守，悉以斥诸贾客。”^⑤刘鹗：“（泥封）在昔不见于著录……云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卖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帖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予考《长安获古编》所载凡二十品，然则刘氏复有续得也。其后蜀中、山左各有所出，为数当日夥，予不能得其详矣。”^⑥皆充分传递了玺印出土和流通的信息。

家传和各种方式的收购是历来古物收藏的普遍途径，而对报刊新媒体的运用，则是近代以来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带来的新产物，考古发掘出土古印的不断涌现以及受到藏家关注，亦是20世纪以来玺印收藏来源与以往不同的显著特点。

① 王崇焕：《印林清话》，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46页。

② 张炜羽：《葛昌楹的印章递藏与桑梓情怀》，《西泠艺丛》2022年第9期，第3页。

③ 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④ 陈宝琛编：《澂秋馆印存》，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⑤ 王崇焕：《印林清话》，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50页。

⑥ 刘鹗：《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97—98页。

四、20世纪上半叶印章收藏兴盛之原因

金石器物学的发达是古代玺印受到藏家关注的因素之一。玺印从物件分量上衡量算是金石器物中的小件，虽然不及青铜彝鼎、石刻碑版等重型器物来得受人瞩目，但是古代玺印因其特殊的含义、用途和多样的形制，直接反映古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制度功能，包括官职制度、日常生活规制、凭信传递、各国文字演变等，成为后人研究古代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的重要实物。再者，玺印、篆刻本身的艺术之美在其章法、刀法、材料、形制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从古玺秦汉印到明清流派印，呈现出推陈出新、丰富多彩的气象，方寸之间彰显出印章艺术的魅力，正如唐醉石在其《治印浅说》中引用吴昌硕谈论篆刻艺术价值时所说：“（篆刻）雄伟瑰丽，浑穆隽秀，其奇气横恣，古意盎然，绝不为方寸间所囿者，直可与商周彝器、秦碣汉碑，炳炳煌煌之巨制并似也。”^①这样一种兼有文化与审美欣赏多重价值的艺术品，自然受到金石收藏家、研究家和学者们的青睐。

由于古文字与书法、篆刻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文字学的发展对古玺、篆刻进入研究家和收藏家的视野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清代以来，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古文字整理与考证、阐释、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热衷的话题。清末民初，因为甲骨文、简帛以及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发现，文字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古代玺印因其以古文字的形、义为依托，可以与古文字的发展演变相互印证，也成为清代以来古文字学家、金石爱好者收集、收藏的对象。

清代中后期几大玺印收藏不仅是清代以来玺印收藏的大集结、大汇总，也为清末民国时期玺印篆刻的聚散、鉴藏、流通奠定了物质基础。黄宾虹在《宾虹草堂集古玺印谱序》中写道：“壮而万里，舟还渐水，信宿绵上，过汪切庵飞鸿堂，见各种印谱，低徊久之。风徽未沫，雪泥已消，鼎鼎百年，觥觥大集，询其所存古印，散佚尽矣。乃复江淮作客，岁得一归，退耕缮渠，晌延十稔，力之能致，缘尚不慳，窃自喜耳。性与俗迕，来于海滨，时有古欢，萃此吴会。三千珠履，愿怀春申之风；十六金符，如读延陵之碣。侯门昼冷，神物夜飞，入市肆以惊人，典征衣而易我，则孙卿所佩，秦斯之篆，尤足珍也。”^②道出古玺印章流失散佚的情况。时局变化，人世沧桑，古物有聚便有散，20世纪以来民间私家收藏的活跃也得益于清代诸如张廷济“清仪阁”、陈介祺“万印楼”、吴大澂“十六金符斋”、吴式芬“双虞壶斋”、吴云“二百兰亭斋”等的收藏。如陈介祺藏古印7000余方，又得吴式芬所藏，共计近万方辑成《十钟山房印举》，陈氏与吴氏为儿女亲家，故《印举》成后，陈氏将吴旧藏归送其婿吴重熹，吴氏所藏后尽悉散出，先为徐世章所得，后归周叔弢。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买国债，周氏将其所得吴氏旧藏全部售予故宫博物院。此类印章收藏的流散和重新洗盘，为20世纪印章的流通和收藏交易市场的活跃带来新的契机。

此外，大量新出土的玺印、封泥、陶印，不仅为历史文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佐证，也为20世纪的玺印鉴藏增添了新的值得关注的物质对象。时有收藏家、古物商贩长期奔波、蹲守于关中、山左等地，一有玺印出土便迅速抢购殆尽：“近年以来，京师古玩商人，接踵而于途，纷往塞上，力求

① 唐醉石：《治印浅说》，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

② 黄宾虹：《宾虹草堂集古玺印谱序》，《黄宾虹文集·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古印，以致近日价日昂而出品益少。古墓荒山，发掘殆遍，菁华已竭，谁尸其咎？”^①这便是当时玺印发掘出土和流通的写照。出土对于古代玺印遗存、古代玺印文化和篆刻艺术的研究，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成为除流传有序的实物流通之外的又一个新的、丰富的来源，刺激了印章收藏交易市场的繁荣。

另外，印章收藏的兴盛还受到私家家族及朋友圈流通的影响。收藏品的流通，除了收购买卖以外，家族金石圈的交游活动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陈宝琛在《澂秋馆吉金图》后序中提及：“先君（陈承裘）癖嗜金石。随侍先大父关中，处署者五年。时吴子苾阁学方为陕藩，相与许鉴考证，所受益最多。洎随宦山左，续有所益。”^②吴式芬是金石收藏大家，与陈介祺为儿女亲家，与陈合作《封泥考略》，是清代最早的封泥收藏者和研究者。陈承裘受吴式芬影响，拓展金石收藏的范围，也参与收藏封泥，又影响到下一代。可见当时世家大族的金石交游圈共享信息来源和收藏渠道，互通有无，共访金石，也带动了金石玺印收藏氛围的高涨。

最后，专业社团组织对鉴藏活动具有推动、刺激、催化作用。近代美术专业社团的成立使得家族之间私家流通收藏的模式逐渐转变为社团组织之间共享流通的收藏模式。众多私家家族金石圈交游的繁盛也为日后金石社团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条件。如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金石学研究团体“冰社”，囊括了玺印收藏大家陈宝琛、罗振玉、柯昌泗家族等。冰社社章规定：“每周六或周日为聚会之期，参加聚会者，各携所藏或新得金石文物到会，考释文字、鉴别年代，以收切磋琢磨之效，并互通消息，互赠拓本、书报，开展学术交流。”^③另外如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黄宾虹1926年倡导成立的金石书法艺观学会，李叔同、经亨颐等金石收藏家组成的乐石社等。私人玺印收藏家成为社团成员后，原本私家的金石圈交游活动逐渐被社团的公众活动所取代，社员们经常举行雅集活动，共享学术资源，使得收藏圈辐射面更为广泛。

当然，要说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印学社团，西泠印社必然首屈一指。在20世纪众多的玺印篆刻收藏家中，西泠印社社员占据了半壁江山，如江南藏印巨擘“浙西四家”中的丁仁、高时敷、葛昌楹都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俞人萃是早期赞助社员，四家曾于20世纪30年代各出所藏，辑成《丁丑劫余印存》二十一卷成书出版，为印章的收藏和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如吴隐、王福庵、黄宾虹、马衡、张鲁庵、吴湖帆、钱君匋、戚叔玉等都是个人或家族式的藏印大家，也都为西泠印社中人。印社成立以来，社员们将私藏金石书画聚于印社，无私捐赠的行为成为一种优良传统，由私到公，既是藏品的汇集，也使得藏品的鉴藏和利用更为开放，社员经常以印社为据点，以藏品为对象，品鉴金石、研讨印学。丁仁在《西泠八家印选》跋中就提到丁氏家族对“西泠八家”篆刻的收藏，至丁仁则“见有遗刻，不吝重金以购之。复于孤山之麓，集二三同志立西泠印社，互相讨论。阅日既久，藏储益美备矣”^④。社团组织的鉴藏雅集和交流活动，也使得收藏流通的模式和范围更

① 王崇焕：《印林清话》，王梦笔编著《民国印学文论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50页。

② 陈宝琛辑，孙壮编次：《澂秋馆吉金图》后序，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③ 史树青、傅大卣：《冰社小记》，史树青《书画鉴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

④ 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66页。

为开阔。西泠印社的社约，每年的雅集，周年大庆活动，国际金石书画交流^①，都体现出金石收藏共享和流通的信息，这无疑刺激、推动了金石收藏的热度。此外，西泠印社旗下的产业经营，如1904年在创办西泠印社的同一年，吴隐在上海创办上海西泠印社，开设书肆和门市部，经营书画篆刻用具以及出版刊行印谱，为篆刻、印谱的收藏、流通提供了渠道。凡此种种，其中西泠印社中人的贡献，以及印社的社团活动作为一种媒介和纽带，其推动之力功不可没。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副所长）

^① 1913年中日两国分别举办“兰亭纪念会”，河井仙郎撰写的《西泠印社修褷纪盛》记录了这一盛况，其中写道：“今年为晋永和九年后第二十六癸丑，西泠印社举行兰亭纪念会……又各出金石书籍交换，会中陈列名书古画多至三四百种，皆藏家精品……”参见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